

国际关系视角下的 近代日本海外移民

——以近代日本的美国移民与日美关系为中心

吴占军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

【内容摘要】 近代日本海外移民活动，同为亚洲的近代移民大国中印两国迥然相异，极具特色。近代日本海外移民的动因、政府的移民政策、移民思想、移民流向的特点、因移民引发的国家间角力、日本扩张主义与海外移民的关系、经济侵略主义与海外移民等等问题，也构成了考察近代日本的一个重要部分。本文以近代日本的美国移民与日美关系为中心，通过日本政府如何处理“元年者事件”、如何应对“排日运动”、日本海外移民政策合理化调整等问题的分析，借鉴已有的国际移民理论中的相关论说，在国际关系视角下考察近代日本的海外移民问题。

【关键词】 海外移民 国际移民 元年者事件 排日运动 日美关系

近代日本海外移民活动，不仅与近代欧洲海外移民截然不同，与同为亚洲的近代移民大国中印两国也迥然相异，极具特色。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不同，与日本的近代化历程中始终贯穿着“东—西文明”碰撞、倾轧的独特模式密不可分。本文拟借鉴已有的国际移民理论中的相关论说，以近代日本的美国移民和日美关系为中心，在国际关系的视角下考察近代日本的海外移民问题。

一、近代日本海外移民研究视角的选择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的重要转折点，1868年新政府成立之初所面临的内外交困局面与德川幕府末期所面临的处境并没有太大改观，新政府的领导者们自上而下强力推进革命清算，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各个层面，逐步摸索和调整着适合日本自身、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的近代化道路。《朴茨茅斯条约》的签订，则标志着日本加入了帝国主义强国的站队。日本作为后进型近代化国家的典型，打着“脱亚入欧”的旗帜，不

仅成为称雄一时的亚洲强国，进而加入侵略和奴役亚洲邻邦、瓜分世界的“强盗”之列，同时高喊“亚洲盟主”的口号，展开了与西方列强的纷争。日本的近代化历程充分体现了“东—西文明”碰撞、倾轧的独特路径。近代日本海外移民活动正式在这一独特模式下展开，在这一视角下进行研究也为我们了解近代日本近代化全貌提供了一个全新切入点。

关于西方国际移民理论我国学者已经做了相对充分的译介，代表性的论文有黄为葳翻译的华金·阿朗戈的《移民研究的评析》、李明欢的《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和傅义强的《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述略》。^①主要的理论有推—拉理论、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Neoclassical Economics）、新经济移民理论（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和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s Theory）、移民网络说（Network Theory）、移民文化说（Migration Culture Theory）、累积因果关系说（Cumulative

Causation) 和移民系统理论 (Migration Systems Theory) 等。上述理论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国际移民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机制, 学者们在部分认同上述国际移民理论的基础上, 同时直接指出了这些理论存在的明显缺点。华金·阿朗戈就指出“移民理论多有一种认识上的弱点。所谓‘理论’是指一套逻辑上环环相扣的前提, 由这前提得出可证实的表述。按照这标准, 目前的移民理论大多不够格, 顶多有个别例外”^②。“除了一般性的通病外, 移民研究的困难恰恰寓于它所考察的对象之中。移民实在难于界定难于测量, 多方面多形态, 不易理论化 (Arango, 1985) ——‘混混然而无法分缕析、定型定式’ (Davis, 1988, 245)”^③。就日本近代海外移民情况来看同样如此, 任何一种理论都可能部分的提供切入方法, 却又无法全面解读。当然, 移民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也注定不可能有一个完美无缺的理论对其进行全面阐释。

我国学者对近代日本海外移民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缺少对移民理论的运用, 在政治层面和国际关系方面对海外移民的考量相对缺如。移民系统理论认为国际移民不仅是特定经济关系的产物, 也是特定政治、文化、历史、国际关系的产物, 且这种人口流动有着明显的地域特征。近代日本海外移民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即以劳动就业为主要目的的海外移民和殖民地移民。海外移民经历了最初的夏威夷移民——北美移民——南美移民的主要脉络, 同时也包含了南洋、澳洲等地的移民。这种人口流动所具有的明显地域特征, 直接反映了日本国力的变化和所处国际关系中地位的变化。因为日本殖民地移民 (朝鲜、我国台湾、我国东北地区等地) 与一般意义上的海外移民性质有着本质区别, 故本文所讨论的近代海外移民并不包括这部分内容。“除了社会文化因素之外, 移民规模不大的原因还要到政治领域去寻找, 说得准确些, 要到政府的重要角色中去寻找。政治方面的影响今天决不可低估。再没有什么因素能比准入政策更影响移民的流向和规模了。金斯利·戴维斯 (Kingsley Davis) 说得好: ‘移民是政策的产物’ (Davis, 1988, 29)。任何以经济为主要理论的移民理论, 在充满政治考虑和政府干预的国际移民面前, 无不狼狈周章”^④。像华金·阿朗戈

一样大多数西方学者主要是从移民接收国的角度来解读移民问题, 更多的关注移民接收国准入政策对向移民流向和规模产生的影响。这在日本海外移民问题上得到充分印证, 夏威夷、北美、南美、南洋、澳洲等地接受日本移民状况大体如此。反之, 从移民输出国来看, 政府的重要角色同样重要, 日本政府与同时期的中印两国政府不同, 印度方面更多反映的宗主国英国的移民主导, 晚晴政府则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压迫下, 消极对待海外移民。而日本则将海外移民作为国策之一, 在整个移民历程中, 体现了浓厚的政治考虑和政府干预。日本政府从一开始就将海外移民问题作为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充分利用当时的国际关系, 最大可能的保护本国海外移民, 并通过海外移民扩张日本国家权益。认真研究近代日本与移民接收国两端间复杂的各种关系, 是深入揭示解决其近代海外移民问题的一个关键。

二、从国际关系视角考量近代日本海外移民政策的调整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和完成时期。19 世纪后半期以来, 当西方人在东亚大力扩张时遇到了较大阻碍, 这是西方在向非洲、南北美洲和澳洲扩张时未曾遇到的问题。明治政府经过近三十年的经营, 日本近代化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在这一过程中, 日本一边打着“脱亚入欧”的口号效仿西方, 力图拉近与西方诸国的关系, 把自己区别于落后“野蛮”、“后进”的中朝等国, 打造成列强的成员之一。不仅如此, 随着军国主义的膨胀, 各种形式的“亚洲门罗主义”在日本一时甚嚣尘上, 俨然要在新一轮的世界瓜分争斗中争得一席之地, 进而作为“亚洲盟主”, 获取远东地区的主导权。日俄战争成为远东国际关系乃至世界历史的重要转折点, 它确立了日本的强国地位, 改变了亚太地区的力量对比。不仅如此, 更具意义的是自征服者时代以来, 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亚洲国家战胜了一个老牌欧洲国家, 黄种人第一次战胜了白种人。这对西方列强绝对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巨大冲击, 也成为西方列强重新定位和调整对日关系的极为重要的考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出于国

家利益最大化的综合考虑,并结合自身实力、当时国际格局及走向预测,对日或采取“怀柔拉拢手法”、或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各个层面采取“打压排挤政策”。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主要指向日本的“黄祸论”开始流行起来,“移民问题”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列强对日钳制政策的一张王牌。随着“排日运动”发展,日本政府也进一步调整成立之初无暇倾力的海外移民问题,“逐渐转变以往的消极态度,从政府层面对海外移民赋予了更多的意义”^⑤,如何解决因移民问题引发的与移民接收国之间的关系成为日本政府必须面对的课题。移民问题能否妥善解决也成为日本政府处理当时国际关系特别是日美关系、伸张国际话语权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日本的海外移民政策也在不断调整,日趋合理化。

1. “元年者事件”^⑥的应对及移民态度的调整

早在幕府末期夏威夷方面便与日本就契约移民进行了协商,移民的实际活动还未履行明治政府就已经成立,“明治政府以与夏威夷王国并未缔结条约为由,全面否定了其与德川幕府的交涉内容”^⑦,但首批移民的渡航准备已经准备就绪,经过一番周折,1868年4月25日153名被称为“元年者”的契约移民,还是在尚未获得新政府的许可下,搭乘英国船到达了夏威夷的火奴鲁鲁,一般将此视为近代日本海外移民的肇始。此后零星的海外移民活动亦在未被官方许可的情况下开始出现。这些早期移民由于语言、文化、习俗和气候等原因,在移民接收国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现象,也由此引发了很多事件——日本学界将之称为“元年者事件”。

当时日本正全力推进国内革新事业,对外则倾力于对西方的考察和条约改正,政府无暇对移民问题牵扯更多精力。来自移民和各方信息大多都是不好的消息,新政府对当时世界移民状况没有太多了解,认为这些移民被移民接收国当成奴隶,这样有损国体。尽管亟待解决的内政、外交事务林林总总,但日本政府在处理“元年者事件”上还是迅速做出了反应。为了解决因“元年者事件”引起的国际问题,1869年9月,上野敬介(景范)、三轮甫一作为移民调查使节受命出使夏威夷,着手处理相关事宜。通过对夏威夷政府

移民政策的了解、种植园的考察,日本移民直接交流,移民使节了解到日本移民被作为奴隶压榨、生活困苦不堪的传言并不完全属实,甚至是夸大其词。上野敬介及时把调查情况向日本政府反馈,从而为妥善处理这一事件准备条件。因为日本和夏威夷两国还未缔结条约,受各方因素的制约,虽然是日夏两国间的问题,但美国、英国也参与进来,明治政府深受刺激。经过几个月的多方斡旋,“折中的解决方案是,调整了(与德川幕府)契约内容,将有意归国的40名契约移民由政府出资带回日本,对有继续留下意愿的移民,夏威夷方面必须承诺改善待遇”^⑧。又经过交涉,初步确定了与夏威夷方面签订“通商条约”的意向。除了40名随船回国之外,大部分移民在三年契约期满后仍坚持继续留在了夏威夷,也得到明治政府的认可。以此事件为契机,日本与夏威夷开始协商通商条约事宜,1871年缔结了《日夏友好通商条约》,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虽然日本与夏威夷缔结了通商条约,但并没有签署移民条约,明治政府依然拒绝了以夏威夷为首的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诉求,皆因日本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中完全处于弱势地位,对因劳工身份移民海外引发国际问题有所忌惮,移民接收国对海外劳工移民不当行的嘲讽,亦被认为是损害国体。1868—1884年,日本政府实际上采取了禁止海外移民的政策,17年间移民总数才1354人,^⑨其中大部分并未获得政府的许可,可以说这一时期海外移民活动基本处于中断状态。尽管明治政府前期采取了禁止移民的消费政策,可从处理“元年者事件”引发的国际问题来看,也适当的显示了日本政府的强力意志。同时刺激了政府对“条约改正”的迫切心情,日本认识到,要实现与列强平等的国际地位必须修正过去的的不平等条约。

1884年日本与夏威夷就移民问题签署了《约定书草案》,两国就向夏威夷输出移民达成共识。最初预定招募600人,实际应招人数竟达到28000余人。显然,与双方前期准备充分密不可分,也体现了日本政府以往对海外移民持消极态度的转变。1884年6月13日夏威夷国王亲自给日本天皇写信,表达了日本政府同意向夏移民输出的谢意。1885年第一批946名日本契约移民赴往夏威夷,

至此夏威夷移民获得明治政府正式承认。1886年两国正式签署《日夏移民条约》《与夏威夷政府缔结渡航条约》，这也是新政府签署的第一个移民条约。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才停止了官约移民的输出，十年间输往夏威夷移民共26批，总人数达3万人左右。这一时期官约移民的流向还有美国本土、加拿大、澳大利亚、斐济、菲律宾等地。

官约移民的出现，才真正开始改变了明治政府近二十年的禁止海外移民政策，近代日本迎来了的第一个海外移民高潮。官约移民带动的第一次海外移民高潮固然可以用移出国和移入国间的“推-拉理论”或“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经济理性选择理论”给出解释，但从日本方面来说，也是随着其国力日渐增强、对外扩张意识不断膨胀的体现。来自夏威夷国王的感谢信除了反应移民问题本身之外，对日本而言也极具政治意义，显示了日本在处理国际问题上更加受到重视，在国际关系中地位逐步得到认同。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日本政府的海外移民政策逐渐由消极禁止转为积极扶持。

2. 日本海外移民与西方“黄祸论”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正值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时期，欧洲人成为人口向外扩张的主要民族，塞缪尔·亨廷顿就指出“人口输出可能是16—20世纪西方崛起的唯一最重要的衡量标准。”^⑩特别是海外殖民地的拓展和开发，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增强。西方殖民者对殖民地早期开发所需的劳动力主要依靠“黑奴贸易”，19世纪10—20年代各国将其先后废止，支撑西方殖民地经济发展的黑人廉价劳动力资源宣告枯竭。在此背景下，来自亚洲的劳动力成为西方殖民开发的主要来源。但是随着亚洲移民的大量涌入，19世纪末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站在“西方中心论”的欧美列强，出于维护并继续扩大自己在东亚的霸权，压制或限制亚洲的发展，抛出带有严重种族歧视的“黄祸论”。所谓的“黄祸”，对西方来说既有历史的记忆，又有文明的隔膜及种族心理上的恐慌。原本作为人类学概念的“人种”一词，已被西方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成为东西“文明冲突”的一种体现。

我国学者罗福惠先生在论及“黄祸论”时，指出“黄祸论”是西方用以向同种示警，并对日本和中国进行诬蔑、丑诋与寻衅的核心话语之一。其说利用“历史记忆”掩饰自利的现实目的，对自己在东亚地区的侵略扩张和霸权主义予以合理化，反诬自卫者和潜在的竞争者为“祸”。^⑪“黄祸”之说在甲午战争前后通过报纸、宣传册、杂志等媒介在欧洲开始兴起，并迅速由英国流布俄、法、德等欧洲国家。1895年夏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亲自炮制油画“黄祸图”(原名为《世界各民族，保护你们最珍贵的财产》)，并由宫廷画师润色完稿，正式提出了“黄祸论”。威廉二世把该画送给俄国皇帝，并把复制品分送给亲友大臣和欧美主要国家的首脑。这幅寓意颇深的画作一定程度上普及了“黄祸论”在西洋世界的影响。^⑫威廉二世还直接向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陈说日俄战争为黄白人种之间的人种战争，在1906年9月6日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达了希望以美国之力，对抗籍日俄战争胜利将变成破坏列强间门户开放政策的日本。^⑬从欧洲到美洲，“黄祸论”不断的被政治家、学者、新闻报纸、甚至是平民们推演。纵观当时国际局势大背景，“黄祸论”主要指向不是中国，而是新近崛起并已然成为西方列强竞争对手的日本。

种族偏见和歧视是历史上美国排斥外来移民的主要因素之一。受1882年“排华法案”的影响，中国赴美移民数锐减，加州地区因此产生的劳动力不足由日本移民接替。据美国政府移民规划局统计数据，1891—1900年十年间日本移民美国本土人数是25942人，同期中国移民人数是14799人，日本首次超过中国。刚限制了中国人，又来了日本人，很快就引起了美国加州地区的恐慌，于是陆续推出针对日本移民的限制法案。日俄战争之后再次引发加州地区的排日情绪，双方迫于国内国际压力，1907年日美当局做出了限制日本移民的外交协商(涉及排日运动的内容后面会进一步阐述)。以此为契机，事实上美国已经将“黄祸”等同于“日祸”^⑭，对日态度日趋强硬。

对19世纪90年代后西方“黄祸论”的流行，敏感的日本人迅即作出反应。“黄祸图”问世次年，

便传到日本国内。据《明治天皇纪》记载,1896年3月14日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就将“黄祸图”呈交给明治天皇,并做了相应的解读。“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伯爵,献上德皇威廉二世所绘黄祸图,此图乃德意志帝国主义有见于甲午战争后日本的勃兴。暗示将来势必引起恐慌,基督教各国应该联合起来对抗日本”^⑮。尽管没有提到天皇的想法,但此举说明日本朝野对来自西方对自身“黄祸”之说十分警惕。1901年,伊藤博文在英国看到这幅“黄祸图”时,就直言德皇所言“黄祸”,“不是处于无力状态的中国而是新兴强国日本”^⑯。与此同时,日本政界、军界、知识界和社会其他阶层(代表人物有当大隈重信、平沼骐一郎、田口卯吉、小谷部全一郎、木村鹰太郎、高山樗牛、桑原隲藏、生田长江、森鸥外等等)纷纷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进行了积极应对,或是反守为攻,指白人为祸;或是嫁祸于人,称中国人为祸。这与欧美列强因日本崛起而感受到的刺激一样,日本也对就西方意有所指的“黄祸论”颇为紧张。但随着国力增强,国内民族主义的高涨,也表达了强烈的对抗情绪。山县有朋在第一次大战之后的1914年所写的外交政略方面的意见书中就指出:世界因人种战争引起动荡,大战(一战)结束后白人将再次入侵亚洲,或许会引发以中国为舞台的白色人种和黄色人种之间的人种战争。白色人种内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然炽烈,黄白人种之间的战争将更加激烈。^⑰据此,为了与欧美对抗,山县有朋抛出了虚伪“日中提携论”,同时利用列强内部矛盾,希望通过进一步巩固日英同盟、强化日俄协约关系来巩固和扩张日本权益。到1930年代,出现了新的殖民主义思潮——源于地缘政治理论的法西斯主义殖民观及“生存空间”的概念。日本反而利用欧美扣在其身上的“黄祸论”,以联合亚洲黄种人抵御白人世界侵略的虚伪旗号,进一步摆出“亚洲盟主”的姿态,并在1930年代将其演变为“大东亚共荣圈”理论。

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黄祸论”的流行高潮时期,尤其是美国则成为“黄祸论”的主力推手,国内排日浪潮不断高涨。一战后巴黎和会的召开为日本与美国交涉移民问题提供了机会。日本希望取得西方各

国对种族平等原则的无保留的承认,并将这个原则列入国际联盟盟约,目的是获得解决移民问题的实际利益。尽管最终没有达成所愿,但是从交涉的过程来看,日本还是在政治层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这种以“人种之争”为由头的日美争斗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显然,因移民问题引发的“日祸”(即“黄祸”)舆论压迫和“排日运动”成为了双方对抗的直接体现。

3. 国际关系视角下美国的“排日运动”

近代以来,欧洲列强在亚洲地区扩张势力的过程中,特别是对东北亚地区的侵略过程中,是以牺牲中朝两国权益为代价,通过一系列条约和协定,为各自的利益而展开了纵横捭阖的综合斗争。笔者将从鸦片战争至二战结束的东北亚国际关系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鸦片战争(1840年)——日俄战争(1905年),欧洲列强处于主导地位;第二阶段日俄战争(1905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确立(1922年),日美势力膨胀与欧洲列强分庭抗争;第三阶段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确立(1922年)——二战结束(1945年),日美势力处于主导并相互竞争。这样的划分也许不够严谨,但是大体尚能廓清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发展脉络。

1898年美国将夏威夷划入自己版图,又通过美西战争占领菲律宾,1899年提出对华“门户开放”宣言,在亚太地区势力日渐增强。日本则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逐步确立了在东亚的强势地位。日本和美国的崛起,更是在极大程度上减弱了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受欧洲国际关系影响和制约的色彩,明显地显露出自己独特的特点。日本对外政策的核心是夺取东亚的帝国主义霸权,它对欧美各国的关系无不是围绕着这一轴心而展开的。而美国对东北亚的政策则是围绕着它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地位而展开的,绝少受欧洲国际关系的影响和制约。^⑱可见东北亚国际关系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后,日美之间的竞争越发激烈。这一国际关系上的变化也直接反映在美国本土的“排日运动”上。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确立,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对一战后列强关系进行调整,对世界秩序重新安排,实际上构成了帝国主义国际

关系的新格局。通过一战美国和日本实力都得到空前加强,在远东地区的话语权也进一步加大。特别是美国,通过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扩张自己势力的同时挤压日本的既得利益,表现出了不同以往的强势态度。这种国际关系上的竞争,在美国的日本移民问题上,有着直接的体现。表中在美国日本移民人数的变化,能很好反应美日关系与对日移民政策的杠杆作用,而美国对日移民政策的调整又从侧面反映了两国关系的变化。

表 1 1820—1930 年 110 年间日本和中国移民美国的人数^⑨

年份	日本移民数	中国移民数
1820—1840	数据不详	11 人
1841—1850	数据不详	35 人
1851—1860	数据不详	41397 人
1861—1870	168 人	64759 人
1871—1880	149 人	123201 人
1881—1890	2270 人	61711 人
1891—1900	25942 人	14799 人
1901—1910	129797 人	20605 人
1911—1920	83837 人	21278 人
1921—1930	33462 人	29907 人

1882 年美国推出以种族偏见为基础的排外法案,使中国人成为不能向美国自由移民的唯一民族群体,标志着美国政府排斥华人的开始,他在法律上使美国社会上的排华现象合法化。1884 年法案禁止任何华人从中国或其他国移民美国。1888 年法案规定,凡是历经返回中国的华人一律不准入境。1892 年国会决定将《排华法案》延长十年。1902 年国会决定无限期延长,吞并夏威夷后,适用于夏威夷群岛。至此,美国政府对华人移民彻底关闭了大门。

受 1882 “排华法案”的影响移居美国的华人数目锐减,加州农场主亟需的劳动力则由入境的日本移民来接替。来自日本的移民也主要从事农场、矿山、渔业等繁重的体力劳动,还有少量移民在城市里经营店铺和小企业等相关行业的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从事农业的移民中有一些人通过承包和分成的方式逐渐拥有小块土地,经过他们的精耕细作,农产品的产量和产值都在不断增长,这与来自亚洲的其他国家移民有着明显的不同。随着日本移民人口的增加及日本在农业领域

取得的成就,引起了加州一些白人的不安,限制和排斥日本移民的情绪日益高涨。有些加州政客和排外主义者公开要求加州议会和国会制定类似“排华法案”的排日立法,加州政府甚至采取了一些苛刻的限制措施,如禁止日裔儿童进入公立学校(1906)。但美国政府出于在远东国际关系中日作用之考量及日本政府的积极交涉,这一发展趋势为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所及时制止,并没有立即推出“排日法案”。直到日俄战争之后,美国的排日运动再次兴起。于是就移民问题,日美两国政府陆续展开谈判。负责具体谈判事宜的是美驻日大使奥布赖恩(Thomas J. O'Brien)和日本外务大臣林董,双方在 1907 年至 1908 年间就日本移民赴美问题达成了 7 个政府间换文,1908 年 2 月,《日美绅士协定》(《日美劳动移民相互截止协定》)正式签订。双方达成的协议是日本政府对劳工拒发护照,而美国则不颁布禁止日本移民入境的排斥性法案。《日美绅士协定》表面看起来日本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同时也反映了这是双方相互妥协的一个方案。美国的排日运动和相关法令在加州延续了几十年,议会于 1913 年颁布了《外籍人土地法》,禁止不够资格申请美国国籍的外国人拥有加州土地。法案中没有出现“日本人”,但从受冲击的效果来看,日本移民受影响最大。该法案实际上是对《日美绅士协定》的破坏和否定。该法从全国来讲,加州在这场旨在阻止美国接纳日本移民的政治运动中带了头。^⑩1920 年再次颁布指向日本移民的更为严苛的《外籍人土地法》,所以日本将之称为“排日土地法”也就不难理解。这些法令和“排日运动”也反映了当时日美两国在远东地区竞争的结果。直到美国 1924 年移民法(又称约翰逊-里德法案)的颁布,日本移民也属于受排斥之列,事实上也是受冲击最大的,在日本亦将此法案称为“排日移民法”(通常所指的“排日移民法”也包括上述所有限制日本移民的法案)。日本驻美大使埴原正直就这一法案向时任美国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递交了书简,提出抗议。但此时美国在远东的势力已经今非昔比,总统小约翰·卡尔文·柯立芝(John Calvin Coolidge)拒绝了日本的要求,“排日移民法”对

日本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1941年12月7日,日本发动珍珠港偷袭行动,美国深受冲击,迅速采取了对日本移民的报复性措施,1942年2月,罗斯福总统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授权军队可以将“有关人等”从军方指定的“军事地区”内赶走,“安置”在其他地方。包括男女老少,有12万名日本移民被强制运到阿肯色州一带的荒无人烟拘留营中,拘留一直持续到1946年战争结束。美国学者托马斯·索威尔(Thomas Swowell)就指出,日裔美国人的历史,是一个悲喜交集的故事。……日本人遭受的冷眼和遇到的隔阂也堪称最甚,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被投进拘留营。^{②1}

受“排日移民法”的限制,以劳工身份移民美国的日本人受到限制,但这些法案本身存在着诸多漏洞。以“自由移民”、女性移民形式赴美移民反而有所增加,这也客观上促成了日本海外移民定居趋势的发展。移民家庭的生长,也促成了海外日本人移民社会的发展,前述表1中的移民数据提供了最直观的索证。可以说日本政府以美国“排日移民法”的实施为契机,实现了日本移民政策的一大转变——政府由以往的鼓励“出稼”移民转变为鼓励移民归化,并开始进入推行谋求“共存共荣”的保护奖励主义阶段。确实,以往赴美移民的人多半是以“出稼”为目的,契约期满且赚到了钱后就要“衣锦还乡”,排日移民法的限制使得日本人不能再到北美地区“出稼”,已经移民美国的日本人,因为对二次入国等问题的限制也大幅减少了流动性,日本政府正式在这种与美国的交涉斗争中认识到了这点,转而鼓励移民归化,因美国排日移民法的限制后更多的移民流向南美,归化现象明显增多,这与日本政府政策的转变关系重大。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美国的排外移民法案不仅是单纯的种族排外主义,特别是“排日移民法”与美国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变化相联动的,或相对严苛、或相对宽松皆由两国竞争状态而定;再看日本,尽管表面看美国用移民问题来打压日本,但反过来日本很好的利用了移民问题来对抗美国,并且随着其国家实力增强和在亚太地区发言权的扩大,已经最大程度的保证了日本移民在美国的利益。与之明显区别的就是华人在美国遭

受到待遇,清政府抗议基本不受美国关注,如果当时中国亦如日本一样实现国家独立,成为亚洲强国,华人在美国的遭遇绝不至此,海外华人的出现(及其所受的遭遇——笔者加)和这个伟大文明的衰落是相关的。^{②2}正是由于日本实力的壮大,可以与美国进行抗衡,所以日本政府的移民政策逐渐趋于合理化,且最大可能的保护了海外移民的权益。

美国的对日移民政策和日本就移民问题与美国展开的对抗是近代美日关系的一个折射,显然这种影响是双向的,托马斯·索威尔就指出日美关系也影响了日裔美国人的历史。^{②3}结合时代背景以美国“排日移民法”为纵轴,以日本移民问题为横轴,对廓清19世纪末20世纪中期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特别是理解日美关系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视角。

三、日本海外移民政策的合理化调整

近代日本的海外移民政策,是一个逐渐合理化的过程。明治初期对内集中精力推进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总体的近代化改革;对外一方面积极谋求解决与西方不平等地位的“条约改正”事业,一方面把西方那套侵略理论套用在同为东方但在其眼里已是“落后、野蛮”的中朝两国。海外移民活动虽然也伴随着世界移民潮迎面而来,但其在日本整个近代化初期尚处于从属地位,新政府还没有太多精力处理,而且“元年者事件”引发的可能有损国体疑虑,也是明治政府对海外移民继续采取了消极政策的切实考量。所以在处理了初期移民引发的“元年者事件”之后,自1868年至1885年近二十年间日本海外移民活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与同时期的印度和中国截然不同。在东西“文明冲突”的紧要关头,日本谨慎的对待一切可能与西方发生不必要的摩擦和关系恶化的问题。虽然尚未出台相关海外移民的正式法规,还是明确的拒绝了来自海外各国的移民诉求,采取了消极准出政策。

随着近代化事业取得的成果不断显现,国力得到显著增强,对待海外移民事业日本政府逐渐改变了此前消极政策,1885年首批夏威夷官约移民在政府主导下,掀起了日本近代海外移民的第

一个高潮。日本在处理移民问题上也是在探索中前进,1891年在外务省下设移民科这是日本政府首次设立专门负责移民问题的机构,1894年《移民保护规则》和1896年《移民保护法》(又先后经过1901年、1902年、1907年三次修订)的制定和颁布,尽管这些法规存在着很多缺陷,但也表明了日本政府的态度,加强了对海外移民保护的认知和能力,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实力和国际认可度。随着19世纪末“黄祸论”的流布与20世纪初以美国为首的各国排日风潮的高涨,日本政府更是急于将自己放在一个等同于西方强国的地位,充分发挥其在东亚地区的地缘优势,积极利用与西方列强的同盟或协约关系,最大可能的在移民问题上保障日本移民在接收国的各项权益。并积极使移民政策合理化,当在北美(美国、加拿大)移民受阻后,又积极开拓新的移民市场。可以说近代日本在南美洲尤其是巴西移民繁荣景象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北美的“排日运动”。尽管随着日本在亚太地区侵略态势的发展也招致了来自南美各国的“排日运动”,但是日

表2 近代日本海外移民地区别人数统计^②

地区	主要国家	1868—1945年
北美地区	美国(包括夏威夷)、加拿大等	411409人
地区中南美洲	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秘鲁等	244172人
南洋地区	菲律宾、澳大利亚、荷属东印度、英属印度地区及英属马来西亚、泰国等	81768人
其他地区	俄国(包括苏联时期)等地	29539人 (1899—1935年)
	合 计	766888人

表3 1868—1941年日本海外移民国别人数^③

顺序	国家(地区)	人数	比率
1	夏威夷	231359人	37.45%
2	巴西	188901人	30.54%
3	美国	107253人	16.86%
4	加拿大	35522人	5.74%
5	秘鲁	32917人	5.32%
6	墨西哥	14505人	2.35%
7	阿根廷	5415人	0.09%
*	总数	774867人	

本近代海外移民的主要流向和移民规模基本确定下来,如表2和表3中的数据说明非常直观。这种流向和规模时至今日依然如此,当前日本海外移民排在前六位的国家依次是巴西、美国、秘鲁、加拿大、阿根廷。

国际格局的变动尤其是远东地区的日美关系对近代日本海外移民模式产生深远影响,但从移民政策的选择来看,则反映了日本内部及移民接收国之间的价值取向和优先目标,日本政府的移民政策与移民活动的管理日趋合理化。在移民输出前,日本政府逐渐健全相关政策。比如在移民教育方针上,向国民进行国际知识的普及、对移民接收国的总体情况进行宣传、设立移民教育机构等;在海外移住扶植方针上,补贴海外移民前的准备金、简化移民办理手续、增设港口的移民临时住所、改善移民募集方法等;在统合民间移民公司和移民相关团体方面,整合改造移民公司、增加职业介绍的机构、整合改造海外协会及相关团体;在移民资质的选择上,严禁不适合移民的劳动者出国、出国前做严格的身体检查、考虑移民家庭因素等;在移民输送环节,改善移民运输船只的卫生状况、实施移民保险制度、创设移民监督官制度、设置移民纠纷的调停机构等;另外在海外移民相关产业如金融机构的扶植及移民公益设施如收容所等设置方面都做了日趋完善的制度规定。针对接收国的现地管理及与移民接收国之间的关系也做了较为详细的制度保证。针对各国的排日活动和限制政策方面,政府积极出面斡旋、防止对方排日政策的恶化、尽量消除不平等待遇、整備移住地医疗卫生设施、确立移民出发前的身体检查、确立移民在渡航中的保健制度、严格提高移民素质等;在促进经济关系上,促进与移入国的贸易关系、促进海外移民创办企业、在移入国设立金融机构、协助移民收益金的资本化和移住地投资等;在海外居住及土地政策方面,鼓励农业适用地的调查和试种、扶植土地“特许权(尤指由政府或雇主给予的)”的获得、扶植拓殖公司的设立和发展,斡旋农作物市场及贩卖、扶植农业团体等等。上面所列的日本政府移民政策,具体到每一个都值得认真研究,限于篇幅将另作文章解读。

注释:

① 华金·阿朗戈:《移民研究的评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1年第3期;李明欢:《20 实际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傅义强:《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述略》,《世界民族》,2007年03期。

② 华金·阿朗戈:《移民研究的评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1年第3期,第44页。

③ 华金·阿朗戈:《移民研究的评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1年第3期,第44页。

④ 金·阿朗戈:《移民研究的评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1年第3期,第43页。

⑤ 吴占军:《明治政府海外移民态度转变的原因探析》,《日本研究》,2014年第1期,第72页。

⑥ “元年者事件”:是指因早期海外移民引发的移民接收国与日本之间的摩擦和交涉一系列事件。

⑦ 中嶋弓子:『ハワイ・さまよえる楽園』,東京書籍,1993年,第133-136页。

⑧ 中嶋弓子『ハワイ・さまよえる楽園』,東京書籍,1993年,第133-136页。

⑨ 根据所引书中的相关数据统计而得。外務省領事移住部:『我国国民の海外发展——移住百年进程(资料编)』(1971年),第137页。

⑩ 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等译:《文明的冲突域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18页。

⑪ 罗福惠:《“黄祸论”与日中两国的民族主义》,《学术月刊》,2008年5期,第135页。

⑫ 飯倉章:『黄禍論と日本人——欧米は何を嘲笑し、恐れたのか』,中央公論新社,2013年,第53页。

⑬ 飯倉章:『黄禍論と日本人——欧米は何を嘲笑し、恐れたのか』,中央公論新社,2013年,第142-143页。

⑭ 飯倉章:『黄禍論と日本人——欧米は何を嘲笑し、恐れたのか』,中央公論新社,2013年,第169页。

⑮ 宮内庁:『明治天皇紀 第九』,吉川弘文館吉,1973年,第32-33页。

⑯ 飯倉章:『イエロー・ペリルの神話——帝国日本と「黄禍」の逆説』,彩流社,2004年,第93-95页。

⑰ 大山梓編:『山県有朋意見書』,原書房,1966年,第359-360页。

⑱ 崔丕:《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绪论》,《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5期,第66页。

⑲ 数据来源:美国政府移民规划局统计数据:2000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the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转引自中野昌彦『日米交流 Japan-US Encounters Website』,http://www.japanusenounters.net/.

⑳ [美]托马斯·索威尔著,沈宗美译:《美国种族简史》,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173页。

㉑ [美]托马斯·索威尔著,沈宗美译:《美国种族简史》,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页。

㉒ [美]托马斯·索威尔著,沈宗美译:《美国种族简史》,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165页。

㉓ [美]托马斯·索威尔著,沈宗美译:《美国种族简史》,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145页。

㉔ 根据所引书中的相关数据统计而得。外務省領事移住部:『我国国民の海外发展——移住百年进程(资料编)』(1971年),第137-145页。

㉕ 根据所引书中的相关数据统计而得。外務省領事移住部:『我国国民の海外发展——移住百年进程(资料编)』(1971年),第137-145页。

(责任编辑 于振冲)